

反對派民意下滑「鍾氏民調」出招救亡

焦點
評論

方靖之

這場由反對派掀起的政治風波已經持續近3個月，暴力衝擊不斷升級，對社會造成的破壞愈來愈大，暴徒同樣是損兵折將，已有近900人被拘捕，100多人正被檢控，但暴力不斷升級，無日無之的不合作運動、破壞搗亂、擾亂居民生活的行動，也引來愈來愈多民意的反感。

民調結果不符事實

事實上，近幾次遊行人數已經大幅減少，一些行動更是動員乏力，基本上只剩下最極端、最死忠的一群，而暴力衝擊愈演愈烈，接近失控，某程度也反映了民意正不斷流失，幕後搞手才要狗急跳牆、孤注一擲，加上特區政府正考慮祭出《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這把「尚方寶劍」，將大大提升政府「止暴制亂」權力，不但可以通過制定各種「規例」停止各種遊行衝擊，而且可以使用法律手段針對一班幕後搞手予以拘捕、遏制、凍結資金等，對於幕後搞手將發揮巨大的震懾作用。

面對民意下滑，幕後搞手為了救亡，近日再次派出其「御用民調專家」鍾庭耀出來發表所謂民調，結果顯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的民望、市民對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的信心，均創下新低甚至出現嚴重負數云云。鍾庭耀已經離開了港大民研計劃自立門戶，成立所謂「香港民意研究計劃」，但其本質和定位都沒有改變，都是為政治服務，尤其每每在政治風波爆發之時，「鍾氏民調」都會在最適當的時候走出來，扮演引導、偽造民意的角色。

「鍾氏民調」的偏頗、不科學，過去早有大量

明證，舉其最新的民調為例，民調指受訪者對「一國兩制」信心淨值為負二十八個百分點，創一九九三年有紀錄以來的新低。

所謂信心本來就不容易量化，真正要量化也不過是要麼有，要麼無，斷不可能出現所謂負數！而且，這個結果也不符事實，從建制派以往的選舉得票，從近期數十萬市民走上街頭支持特區政府和警方「止暴制亂」，從廣大市民對於中央的認同，這些都顯示出民意對特區政府的支持，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一國兩制」的信心怎可能是負數？難道全港750萬市民都對「一國兩制」無信心，這是事實嗎？根本不可能。

鍾庭耀的民調得到所謂對「一國兩制」負二十八個百分點的信心淨值，邏輯已經不通，更加與香港真實民情相違。如果市民對「一國兩制」如此無信心，反對派早已在選舉贏得開卷，早已全港民意在手，又何用搞出一場政治風波，企圖通過暴力衝擊奪權？

鍾庭耀的民調又造假民意，從時間點上、從民調結果上顯然是為了配合這場風波而來，企圖為這場風波添柴加薪。目前所謂的「五大訴求」已經變質，變成爭取「雙普選」，以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當中已經帶有明顯的「港獨」色彩，企圖搶奪香港的管治權，終於露出了這場風波的真正底牌。幕後搞手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為這些訴求製造所謂「民意」，於是在個幾個月前還抱怨希望籌得600萬經費，當時只籌得2萬元的「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突然財來自有方，突然就有了足夠的資源不斷進行民調，而其民調針對的課題就是兩樣：一是特區政府的民望；二是「一國兩制」的信心。一如所料，鍾庭耀也「得」出了偏頗之極的結果，得出了「一國兩制」信心淨值負二十八個百分點的荒

謬結果。

這個民調結果客觀上正正是配合所謂「雙普選」以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訴求而來，既然市民對「一國兩制」信心是負數，這樣暴徒爭取的「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似乎突然有了民意基礎，而由於特區政府民望極低，落實「雙普選」也似乎是言之成理，鍾庭耀的民調完全是為了政治服務，為了政治「心戰」服務。但調查卻看不出任何科學性、嚴謹性，結果更是令人失笑，如果按鍾庭耀的民調結果，香港早已翻天了，早已有750萬市民上街反政府，反對派早已完成了「時代革命」，但這是事實嗎？相信市民自有公論。

偽造民情挑動風波

說到底，鍾庭耀又造假民意，不過是為反修例苟延殘喘，眼見近期參與行動人數不斷下滑，就「造」出民調出來為暴徒壯膽，令他們以為自己仍然民意在手，煽動暴徒繼續負隅頑抗，繼續做幕後搞手「顏色革命」的爛頭蟀。難怪早前一直喊窮的「香港民意研究計劃」，近日表示已籌得542萬，按其所說每個民調成本為12萬，即是有大把彈藥可以長期作戰。

不要忘記，鍾庭耀亦已接受「禍港四人幫」的陳方安生委託，撰寫所謂民間「反送中民情報告」，試圖製造「民情」繼續挑動風波，「重任」在肩，難怪鍾庭耀近日再次高調，這也說明這場風波已進入民意戰階段，除了特區政府和警方要重手「止暴制亂」之外，市民也要積極發聲，表達真實民意，不要被假民調偽造民意，不要被假民調「代表」。

資深評論員

實施「緊急法」是必須之策

一針
見血

文兆基

反對派掀起的政治爭拗爆發至今，已經擾攘兩個多月。反對派縱容支持者行使暴力，致使社會安寧遭到嚴重破壞。為此，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日前建議，特首會同行政會議若認為香港出現緊急或危害公安的情況，可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任何她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

及後，特首林鄭月娥本周二出席行政會議前，也被問及會否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問題。特首表示，所有香港法律，如果能夠提供法治手段去止暴制亂，政府都有責任檢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接受記者提問亦表示，政府會按照「一國兩制」、香港法律、政府及市民的共同意願，考慮以任何可行手段處理。

平情而論，政府考慮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實在是瓦解暴徒作亂的上佳之策。某程度而言

，暴徒近月來為何難以收拾，主要是他們模仿了外國無政府主義者的「黑群」戰術（Black Bloc）。他們在每次行動前，都會佩戴眼罩和面罩，其功用有二：一是避免吸入防暴警察的催淚氣體，二是避免被人認出樣貌，減低作案後被捕的風險。

暴徒蒙面有恃無恐

正因如此，不少西方國家都制定了《禁蒙面法》，把示威者在公眾聚集期間蒙面，視為意圖發動暴力衝擊的行為，因而列為禁止事項。然而，香港至今未有《禁蒙面法》，致使警方不能單靠示威者蒙面，作為可逮捕的理由，而是要任由蒙面示威者聚集，甚至正式發動衝擊和破壞，才能加以逮捕。如此一來，便大大增加警方的執法難度，亦減低了暴徒作惡之後，被成功定罪的機會率，從而使到暴徒們，變得有恃無恐。

由此可見，政府立即制定《禁蒙面法》，已是

刻不容緩之事，但是我們的立法會大樓已在7月1日被暴徒大肆破壞，致使立法會無法正常運作。即使立法會可另覓場地召開緊急會議，政府也難以循正常方式制定《禁蒙面法》。因為一旦政府宣布立法的話，必然換來反對派的強烈反對，甚至有可能再次煽動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的臨時會議地點，藉此阻礙《禁蒙面法》的立法工作。

在此情況之下，特區政府若要阻止暴徒繼續蒙面行事，便只能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第2（2）（g）條所賦予的權力，頒布緊急禁令，規定任何人除了獲得警務處處長發出的特別許可證之外，不可在公眾地方佩戴任何面罩、口罩或護目鏡，違者視作犯罪，警方即可時逮捕。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效瓦解暴徒的「黑群」戰術。只要暴徒不能再佩戴面罩，便會有所顧忌，不敢再貿然作出犯法之事，香港才有止暴制亂的機會矣。

時事評論員

特首應善用酌情權化解危機

學者論衡

鄭赤瑛

自「6·9」大遊行後，香港街頭不斷發生暴力衝擊警察事件，公共秩序不斷被破壞，包括多個地鐵站、機場、主要幹道等，都因為激進分子強行佔據而被癱瘓。如此逾兩個月時間裏，立法會因大樓被破壞十月前無法開會、行政會議幾度休會，行政長官如何應對？建制派在等待。反對派提出所謂的「五大訴求」，志在迫林鄭下台。中央對林鄭信心沒動搖，相信她有辦法有能力可把危機克服，但中央也不諱言有必要時會很快把局勢平定下來。

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接管機場

中央對特首的信心，基本上是來自「一國兩制」的信心，鄧小平早說過：「要相信香港人能把香港管好，要相信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做得到。」保留港英留下來的制度不變，就是相信原有制度在「港人治港」的前提下，照樣可以把香港管好。中央之所以不插手當前的亂局，正是因為香港本身的制度仍未到「時窮」，特首手上仍握有很大的權力可以克服當前的亂局，本文且試舉出下列大權等待特首出手：

第一，行使酌情權

除了固定可讓行政長官行使的職權外（見《基本法》第四章第一節），特首亦可因應情況的需要使用酌情權，這個權力可賦予行政長官作出臨時的權力去應對重大問題，像當前反對派超越法律與體制的破壞公共利益與社會秩序的集體行動，維持公共安全的執法人員（警察）已難以及時有效恢復秩

序，特首在此時此地便可動用其酌情權，下面是幾個例子，特首是可以利用其酌情權加以處理的。

案例一：機場騷亂

由於涉及的公共利益損害太大，若機場管理局無法阻止成千上萬的激進分子癱瘓機場運作，警方也無法有效阻止，若禁制令也抓不勝抓，這種情況下特首可運用其酌情權。這一來特首不按常理出牌，可打的牌反而更多了，例如把機場全面接管，旅客與機場工作人員一律以「特別通行證」出入，所有通向機場的道路也採取特別行政處理（什麼有效辦法都可用上！）；再不行的話，可考慮宣布機場進入緊急狀態，根據《駐軍法》向中央請求駐軍協助恢復機場及其相關地區秩序，確保遊客安全和機場暢順運作，直到政治風波結束為止。這種「局部緊急狀態」好過等到局勢全面失控後才宣布全港進入緊急狀態。再不然就關閉機場，旅客轉由澳門、深圳，甚至廣州出入，以應不時之需！

案例二：癱瘓港鐵

雖然港鐵公司已取得法庭「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地及故意妨礙或干擾鐵路正常使用及運作、損壞車站內任何財物，及對車站造成騷擾。但禁制令是否有效仍有待觀察，如果數以萬計激進分子違反禁制令，執達吏只靠一紙禁令，面對人多勢眾，相信亦難以執法。若果出現這情況，特首便可採用酌情權宣布所有港鐵車站進入「局部緊急狀態」，向中央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秩序。

由上兩個案例，可以引申到任何涉及暴亂的重大公共地方，都可用同樣的辦法：緊急狀態。這樣做的考慮是確保局勢不致全面影響民生經濟，考慮到香港有被全面拖垮之虞，保障全民的飯碗與安全毫無疑問已是：First Priority(首選)，何況宣布「緊急狀態」也是《基本法》賦予特首的合法合憲權力，

沒什麼負面不負面的問題，只有有無必要的問題！

第二，擴大行政會議

《基本法》第五十五條寫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的成員由行政長官從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其任免由行政長官決定……行政長官認為必要時可邀請有關人士列席會議。」這條文重點在「必要時」與「有關人士」兩點，面對香港現時處於非常時期，現有行政會議恐難於應對當前局勢，因此現在正是「必要」的關鍵時刻。

根據此條文，當前有不少危機在各個領域爆發，例如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員工的罷工危機；學生的罷課危機；質疑警察濫權的危機等等。特首都應快快考慮擴大行政會的列席人數，邀請法律界德高望重的「高人」列席行會，也可以邀請其他陷入罷工與罷課危機界別的「高人」入會。就以罷工來說，有代表性的業界「高人」不乏其人，只要肯誠心物色，不難找到；罷課也然，大學校長或資深教授過去港英時期已名正言順獲邀出任行政局成員，現在如此情況更有必要了！

至於對警隊濫權的質疑，要封住悠悠眾口，物色這方面的「高人」指點迷津，很有必要。醫療與教育界人員，一個是醫病，一個是教人，都最不應該把政治帶入醫院與學校，如此嚴重問題若不早點處理，對醫療與教育兩大公共機構的公信力為害無窮，長遠而言很有必要全面檢討，當前的危機很有必要物色兩業界的「高人」入會，共商大計！

第三，特首還有兩把「尚方寶劍」沒被善用，就是廉署和審計署，這兩個機關依據《基本法》第五十七條與五十八條設立，都是權力特大，而且獨立工作，不受其他部門左右，只對行政長官負責。

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香港反修例風波如何收場？

議事
論事

訓 寒

大規模社會運動收場方式無外乎兩種：一是以雙方妥協達至某種和解收場；二是以決出勝負、一方勝利另一方失敗而告終。

大規模社會運動不同於小規模抗議示威事件可以無疾而終，時間可以成為彌合創傷的良藥。大規模社會運動因其規模、烈度和持續時間與民意高度聚合，很難在短時間內自行消散。以此次政治風波為例，幕後組織者經過精密的策劃，形成了明確的目標、政治訴求、組織體系和對抗策略，從最初的蠱惑、裹挾民意，到目前的聚合民意，已形成強大的反政府力量。此時，政府如果依然採取對付小規模抗議事件的方式來進行處理，期望以時間換取空間，以拖耗來消弭事件，恐怕已很難達至令社會滿意的效果。

堅意志下決心快速平息風波

大規模社會運動的組織者當看到自身的力量和民意已經足夠強大，已經足以與政府進行討價還價時，決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目標。這就像商業交易中的討價還價。此次風波中的幕後組織者——香港反對派為醞釀、發酵和擴大這場風波，已經費盡心機、傾盡全力。他們甚至不惜背上「漢奸」「賣國賊」的千古罵名尋求外部勢力支持，不惜突破道德、法律和人倫的底線與極端暴力分子為伍，目的就是為了增加與政府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因此，當反對派和極端激進勢力風頭正勁時，當他們的政治目標和所謂訴求還沒有達成時，善良的人們千萬不要指望這場風波短時間內能得到平息。

但是，任何社會運動——無論是鬧劇還是革命，最終都會以某種方式收場。以何種方式收場，則取決於雙方力量的對比，而力量對比的變化又取決於雙方的意志、決心、戰略布局和雙方力量的培養和消耗。當反政府力量發展到自身勢力可以與政府一搏時，政府若要快速達成平息風波的結局，可採取的手段也無外乎兩種：一是妥協，二是以壓倒性優勢取得勝利。

在處理任何大規模社會運動時，政府總是處於局部上的被動和全局上的主動。雖然反政府力量總是給施政者帶來麻煩，甚至大幅拖低政府的民意支持度，但只要政府不是主動投降，無論是妥協還是強硬壓制，主動權都掌握在政府手裏。

香港這場曠日持久的、備受世界關注的政治風波，將來以何種方式收場，最終是取決於政府，而不是反對派。以目前形勢看，反對派不會輕易舉旗投降，政府也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以靜待變。但若要将風波給社會帶來的損失減至最低，主動出擊也不失為好的選擇。

資深評論員

盡快設「社會和解委員會」



有話要說

狄志遠

筆者一直相信，對話總比對抗好，無論是家庭問題、人與人之間的問題、社會問題，我們都要透過對話去解決，中美貿易摩擦，雙方都正在努力尋求對話。社會問題，涉及各方利益，如果大家各自堅持己方利益，沒有透過對話去找出最大公約數，達至雙贏，最後就是你死我活的對抗，結果只會雙輸。

近日特區政府希望建構溝通平台，透過與各方對話，化解今天社會的矛盾。推動溝通絕對是一個正確方向，筆者建議成立「社會和解委員會」，有計劃、有系統、有規模地去推展各方溝通。委員會的職能主要是透過不同溝通平台，促進社會溝通，對過往兩個多月來所發生的社會衝突，作出討論，找出問題所在，並尋找改善問題的方案。

建議特區政府委任15至20名有心人組成「社會和解委員會」的骨幹，而每位委員會成員推薦5位有心人擔任「和解員」，並組成一個小組，在自己的領域上建立溝通平台，與各界市民接觸。特首、司長、正副局長盡力出席各溝通會面，直接聽取市民心聲及意見，顯示政府的誠意。創新辦負責支援，協調秘書處的工作。

向特首提出修補方案

溝通平台形式包括有大型公開聚會（100人），自由開放發表意見，讓市民宣洩內心不滿，也聽取一些合理意見。另外也有聚焦小組交流會（20至30人），由不同界別團體舉辦，深入交流。當然社交媒體對話也是十分重要，由專門的「和解員」進入不同的社交媒體，分析網民的意見，並作出適當的對話。

「和解員」用不同渠道在短時間內收集市民／示威者／遊行人士意見，就「止暴制亂」「回復社會秩序」的方向收集意見，並具體向所屬的「和解小組」成員匯報。「社會和解委員會」成員綜合由和解員收集的意見向特首提出不同的和解及修補社會方案。建議每星期做總結，逢星期五交由特首以記者會形式向市民公布階段性的和解方向。同樣，創新辦負責整理和解委員會所收集的意見及制訂報告。

筆者期望溝通平台能盡快啟動，藉着溝通去匯聚社會上不同的聲音，求同存異，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對話總比對抗好。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